

即經類事，以見始末—— 劉朔《春秋比事》中的「屬辭比事」之法*

康凱淋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提 要

傳統以「類例」解經的思維是類聚同樣性質的事件，從相同語式的事辭討論聖人義法。本文即認為「屬辭比事」在唐代以前是《春秋》「類例」模式的方法論，也就是「屬辭比事」是思維運用時的過程、方法、形式，「類例」是思維運用後產生的模組、結果、內容，直到啖助學派重新改造「類例」之後，才逐漸開啟宋儒新變「屬辭比事」的風氣，南宋劉朔《春秋比事》就是在這新變風氣下的著作之一。第二，劉朔在「屬辭比事」的運用方法上，借取《左傳》張本繼末的敘事之法，聯屬前後與事件相關的經文，跳脫「類例」純以遣詞用字為序列的規範，突破傳統「類例—屬辭比事」的架構。第三，劉朔曾推動永嘉學術，和同屬永嘉地域的學者陳傅良相比，劉、陳二人皆綴合前後經文以體現春秋「事勢」之歷史遞變，但劉朔另寓有「理勢」的價值判斷，在歷史事件尋繹出一條「修德」法則，連結「屬辭比事」和「倫理道德」，闡釋春秋歷史人物的行為得失，明顯和陳傅良有不同的歷史解釋。

關鍵詞：劉朔 屬辭比事 《春秋》 《左傳》 德

* 本文為輔仁大學學術研究計畫「《春秋》經的史學化：南宋《春秋》經傳體例改編研究」（計畫編號：A0107001）研究成果之一，特此致謝輔仁大學補助研究。初稿曾宣讀於「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 V」學術研討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18年10月）論文投稿期間，匿名審查委員亦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使本文論述更加完備，在此一併致謝。

即經類事，以見始末—— 劉朔《春秋比事》中的「屬辭比事」之法

康凱淋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劉朔（1127-1170），字復之，莆陽人，南宋紹興三十年（1160）進士，與其兄劉夙（1124-1171）同為林光朝（1114-1178）之門人。^①據葉適（1150-1223）〈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記載，劉夙、劉朔兄弟二人奉公不阿，「輕爵祿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進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為心而不私其身」^②，高風勁節，為時望推重。劉夙長於《春秋》，而劉朔少本喜《易》，後受劉夙影響，改治《春秋》。^③葉適肯定二劉的學術成就：「《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④劉夙曾著《春秋解》，今已佚，唯劉朔《春秋比事》二十卷尚存。

清代《四庫全書》收有一部《春秋比事》，但作者題名為沈棐（？-？）。南宋陳亮（1143-1194）〈《春秋比事》原序〉記：「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

①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艾軒學案〉，《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卷47，頁1474-1478。

② （宋）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2月），卷16，頁301。

③ 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記：「正字少喜《易》，蘄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為王介甫茅塞久矣。』由是更治《春秋》。」同前註，頁302。

④ 同前註。

曰：『是習《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以文辭稱而不聞以經稱也。使其非文伯也，此書可不傳乎？使其果文伯也，人固不可以淺料也。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鋟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⑤書名原是《春秋總論》，是他改易爲《春秋比事》，而此書作者未詳，有可能是湖州沈棐所著。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輯錄《春秋比事》二十卷，亦題沈棐文伯撰，但卻質疑陳亮之語，認爲湖州的確有沈文伯，只是名爲長卿，不名棐，號審齋居士，「不知同父何以云然，豈別有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⑥無法確認作者身分。之後明、清學者也多附從陳亮，視沈棐爲《春秋比事》之作者，例如四庫館臣就直言：「以陳亮去棐世近，姑從所序，仍著棐名。」^⑦

逮至晚清學者陸心源（1834-1894）《儀顧堂續跋》提出辨正：

考朔爲後村之祖，《後村集》有〈二大夫遺文跋〉云：「麟台歿於信安傳舍中，故遺藁尤少，有《春秋比事》二十卷，別爲書」，與譚卿月之言合，則此書信爲劉朔作矣。……朔既以《春秋》名家，又有《後村集》、譚卿月〈序〉可證，其爲朔無疑。……同甫所見之本並無撰人姓名，〈序〉稱或曰沈文伯所爲，亦未必定爲文伯作也，直齋乃始誤會，當改題劉朔名爲是。^⑧

文中提及的譚卿月〈序〉可見於明代都穆（1459-1525）《南濠居士文跋》：「嘉

⑤ （宋）劉朔：《春秋比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8。以下援引是書皆此版本，僅在引文後改用括號註明卷頁數，不另作註。

⑥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月），卷3，頁66-67。

⑦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月），卷27，頁348。

⑧ （清）陸心源：〈春秋比事跋〉，《儀顧堂續跋》，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卷3，頁285。

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則以為著于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⁹四庫館臣也注意到都穆所記，礙於收錄版本未載譚〈序〉，所以不敢採納。陸心源曾見得《春秋比事》影寫元刊本，雖然譚〈序〉大部分內容已佚，但仍存關鍵文字：「頃得劉氏家本，特表而出之」，¹⁰強化劉朔與《春秋比事》的關聯，間接排除沈棐。後又以劉克莊（1187-1269）〈二大夫遺文跋〉為據，印證劉朔撰有《春秋比事》，論斷此書作者實是劉朔無誤。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肯定陸心源所言能彌補提要之失，並足以祛疑，¹¹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也都採信陸氏之語，¹²故本文亦主劉朔著有《春秋比事》，作為閱讀考察的依據。

目前學界討論《春秋比事》的著作不多，戴維《春秋學史》除了關注作者異同，也點出「《春秋比事》是一種分類相從性質的著述」，¹³但未有進一步發義。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承自四庫館臣「持論頗為平允」¹⁴的說法，評價是書「若所持議論，要皆平正公允，有合於聖人筆削之微意」。¹⁵另外，張厚齊《《春秋》義法模式考述》將《春秋比事》視作「即經類事」類，歸納兩項解經模式：「以例見事迹始末」、「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與本文要討論的解經方法較有關係。¹⁶不過整體而言，學界多搭配其他類似著作集中說明，屬於概述介

⁹ 原文作「談卿月」，據楊果霖校正：「『譚卿月』三字，《南濠居士文跋》誤作『談卿月』，惟元刊本有嘉定辛未譚卿月〈序〉，故以『譚卿月』為是。」相關內容參見（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本），第1冊，卷1，頁39。楊果霖：《《經義考》著錄「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年1月），卷188，頁1016。

¹⁰ （清）陸心源：《儀顧堂續跋》，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卷3，頁284。

¹¹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1月），卷1，頁59。

¹²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9月），頁75。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年3月），頁117。

¹³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5月），頁384。

¹⁴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7，頁348。

¹⁵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頁75。

¹⁶ 張厚齊：《《春秋》義法模式考述》（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2年6月），頁344-348。

紹性的方式，尚未有專文研究，因此本文有意拓展此課題，先以是書的解經方法為聚焦核心，分析相關的詮釋型態。

二、《春秋》「屬辭比事」的義界省思

陳亮〈《春秋比事》原序〉提出聖人經世之志雖寓於屬辭比事，但患其難通，而劉朔《春秋比事》「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頁8），完全應合他的學思心得。在討論劉朔《春秋比事》解經方法之前，我們可先爬梳歷來對「屬辭比事」的討論面向，以確立是書的學術性質。

（一）學界定義「屬辭比事」的主要面向

學界對「屬辭比事」有不同界說，張素卿整理古代諸家論解，大抵歸納為三：第一，以鄭玄（127-200）、孔穎達（574-648）為代表，他們參照《左傳》，理解「屬辭比事」是「《春秋》聚合外交之辭令，比次寓有褒貶之事蹟」。第二，以宋元學者如劉朔、趙汴（1319-1369）、吳澄（1249-1333）為主，他們依照「辭」類或「事」類重新編排、類聚經文以疏解經義。第三，以清代王夫之（1619-1692）、孫希旦（1736-1784）、章學誠（1738-1801）說法為例，從時間序列以比合事蹟、綴連文辭，而《春秋》編年記事與《左傳》依經敘事就是最佳表現。¹⁷

張氏劃分已得其梗概，近現代學者的討論也多圍繞於此。比方范文瀾就引孔穎達的註解，發明其說：

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襄公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仲尼使舉是禮以為多文辭者是也。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杜預謂之變例者是也。蓋凡例之數有限，情事之來無窮，必待比傳變通，適符其實，始足以無違禮意，垂法將

¹⁷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10-135。

來，宛如法律之有律有例也。故凡例者，周公以來之定律，書不書之類，孔子修《春秋》之變例，所謂比事者也。¹⁸

孔穎達曰：「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¹⁹ 范文瀾以其為據，謂「屬辭」為外交辭令，²⁰ 另外將杜預歸納的《左傳》變例與孔子修《春秋》之變例視為「比事」。

另外，張素卿贊同王夫之、孫希旦、章學誠等人的說法，進一步會通諸家之後，統整定義為：

「屬辭」，指斟酌用語以命字設辭，並綴輯相續以成文；「比事」，指將事件排比編次使整合為一。……依上述「屬辭比事」的原則編次成書時，綴輯排比其「事」的條理順序，若凸顯事序之始終，以時間為綱，這樣形成的體式便有如《春秋》之編年記事。《左傳》既表現事序之始終本末，撰為敘事；諸敘事又依經以編年比次，於是上承《春秋》而發展為編年敘事。²¹

¹⁸ 范文瀾：《群經概論》，《范文瀾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頁250-251。

¹⁹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卷50，頁845。

²⁰ 張素卿研究鄭、孔之定義，認為他們所言的「屬合外交（朝聘會同）辭令」並不符合《春秋》記事的特點，所以鄭、孔主要是參照《左傳》而得到的定義，否則以《春秋》經文來說，無從證明鄭玄所說的：「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換言之，鄭、孔的定義似乎窄化了「屬辭比事」之義，因為他們的對象是《左傳》而不是專對《春秋》。後代也已有否定鄭玄等人以朝聘會同為屬「辭」之義，例如清代官方《欽定禮記義疏》案語：「辭是載事之文，所謂其文則史也，不止是會同之辭。」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10-114。（清）高宗敕撰：《欽定禮記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63，頁99。

²¹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35。

瞿林東也有相仿見解，聯繫《春秋》「編年」記事與「屬辭比事」的關係，高度讚許孔子析理諸國史冊，以編年體體例編寫《春秋》，清楚勾勒歷史發展的輪廓，因此將編年體形式視為屬辭比事。²²而《左傳》中備有原始要終、張本繼末的敘事手法，這也是具體落實《春秋》「屬辭比事」的解經義涵。循此研究思路，張高評的定義亦值得參考：

史事之有漸無頓，良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辭文之散逸橫梗者，宜統合連屬之；載事之參伍懸遠者，當比次類及之。易言之，持宏觀之視野，用系統之思維，貫通全書而進行考察：連屬上下前後之文辭，類比、對比、比興相近相反之史事，合數十年積漸之時勢而通觀考索之，即可以求得《春秋》不說破之「言外之義」，此之謂屬辭比事。²³

文中側重在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因為《春秋》的編年性質，所以許多事迹無法連貫，解經就必須通貫統觀，注意本末、首尾、終始，探求孔子之義，與張素卿的說法相互輝映。

必須補充的是，劉朔、趙汴、吳澄等宋元學者按照「辭」類或「事」類編次經文、疏解經義，張素卿認為他們解經途徑不符合《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的文義，故持保留態度，²⁴但其實若就類聚事辭的方法論來說，這同樣屬於歸納法和比較法，可呈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意義，²⁵與歷來「條例」密切

²² 瞿林東：「《春秋》作為中國現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屬辭比事而不亂』。即綴輯文辭、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規範，全書井然有序。這是說明《春秋》在編撰形式上的優點，一是講究用詞造句、連綴文辭，二是善於綜合、排比史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9月），頁137。

²³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年7月），頁44。

²⁴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20-121。

²⁵ 黃開國：「屬辭、比事的角度不同。但實際上是相通的，在邏輯學上都屬於歸納的方法。」趙友林亦表示：「從三傳及其注疏的具體闡釋看，我認為『屬辭比事』作為一種探求書法的方式，它首先是一種比較的方法。利用『屬辭比事』這種方法，經過前後比較，以明《春秋》書

相關。

凌曙（1775-1829）《公羊答問》云：「《禮》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春秋之世，功有大小，罪有淺深，非例不明。」²⁶晚清皮錫瑞（1850-1908）《經學通論》亦曰：「古無例字，屬辭比事即比例。……夫子以《春秋》口授弟子，必有比例之說，故自言屬辭比事為《春秋》教。」²⁷點出「屬辭比事」和「例」的實質關係。近代學者蔣伯潛《十三經概論》也說：「於文字中求《春秋》之『義』則必『屬辭比事』，以尋繹《春秋》書法之異同，而發現其所以同異之點，此即所謂『例』也。」²⁸陸續都有不少學者持此主張，²⁹觀點別樹一幟，與王夫之等學者的立足點相異。

王夫之、孫希旦、章學誠、張素卿、張高評、瞿林東等人是站在時間序列，重新銜接、聚合、重組箇中可斷性的史事；³⁰而凌曙、皮錫瑞、蔣伯潛卻是打破時間序列，平行地等視所有經文詞類，尋求一致性的邏輯結構，雖然雙方目的都是為了理解《春秋》大義，但採取的路徑截然不同，我們可先回顧北宋以前幾部重

法之異，這是強調書法的特殊性。……其次，利用『屬辭比事』這種方法，經過前後比較，以明書法上的共同性，這又是一種歸納法，即經過比較同類事件，加以歸納推衍，揭示其普遍性。」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頁84-85。趙友林：《〈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頁24。

²⁶（清）凌曙：《公羊答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卷上，頁1。

²⁷（清）皮錫瑞著，周春健校注：《經學通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年4月），頁427-428。

²⁸蔣伯潛：《十三經概論》（臺北：中新書局有限公司，1977年4月），頁462。

²⁹曾亦、郭曉東：「『屬辭比事』者，當排比史事，貫穿文辭，即《春秋》所謂例也。」葛志毅亦言：「由《左傳》等先秦史籍推斷，至少在春秋時史官記事有法，是即所謂『書法』，書法又關乎所謂『屬辭比事』，以此為端，引申歸納出一套《春秋》之例。」曾亦、郭曉東：《春秋公羊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頁97。葛志毅：〈《春秋》例論〉，《管子學刊》第3期（2006年），頁65。

³⁰李紀祥舉出：「史書中的時間序列，是具有可斷性的，也因為具有可斷性，所以我們才得以進行種種敘事活動，如斷代、事件序列安排（選擇事件、用序列性來呈現一種人為選擇構成拼圖的歷史形貌、圖像）、銜接（呈現連貫性，而實則為可斷性的銜接）、聚合、重組……等。」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11月），頁77。

要的經傳著作，彌縫學界看法。

（二）屬辭比事：唐代以前建構「類例」的方法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說：「公穀與左氏皆言例。」³¹三《傳》解《經》，各見其長，但共有「例」。《公羊傳》的「書」與「不書」就是建立在一種規則基礎上，以固定的語式作為判斷標準，再將相異的語式導入大義，「這種通過對書與不書的分析，所得出《春秋》的書法規則，就是後來春秋公羊學所說的例。」³²《穀梁傳》也有其例，清代鍾文烝（1818-1877）提到「《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³³當中尤重時月日例。《左傳》亦是在一基本通例之上，討論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等問題，晚清經學家劉師培（1884-1919）就主張《左傳》義例必由左丘明製訂。³⁴

在漢代《公羊》學的發展，董仲舒（前 179-前 104）《春秋繁露》也建立在類例的基礎上，³⁵述及讀《春秋》宜「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繙援比類，以發其端」的治經方法。〈玉杯〉篇還舉「趙盾弑其君」和「許世子止弑其君買」為例，說明解經「貫比而論是非」的重要。³⁶東漢何休（129-182）《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進一步將類例結合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使

³¹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年8月），頁161。

³²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84。

³³ （清）鍾文烝撰，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7月），頁4。

³⁴ 劉師培〈讀左荀記〉：「五十凡例乃《左氏》一家之學，異於《公》、《穀》。蓋褒諱抑損之義，三《傳》所同，《左傳》所載凡例，乃丘明據師說以釋經旨者也。」（清）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上冊，頁301。

³⁵ 王應麟（1223-1296）《玉海》認為此書之名與屬辭比事有關：「《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綽無繁露。』注云：『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志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年12月），卷6，頁238。

³⁶ 黃開國認為「貫比法」是《春秋繁露》一項重要的運用：「貫比又稱比貫，單言比或貫，是以類例為大前提，既可連貫又可推比的方法。連貫是依類例將分散的事物連屬為一，推比是依類例由此及彼，以至萬千。」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241。

《公羊傳》形成條理分明、完整有序的義例體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杜預（222-285）重新整理《左傳》之例，將「五十凡」的正例溯及周公，另有「起新舊、發大義」之變例、「直言其歸趣」而不含褒貶之非例，並作《春秋釋例》一書。范甯（339-401）註解《穀梁》也看重傳例，〈春秋穀梁傳集解序〉曰：「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³⁷據《隋志》著錄，他亦作有《春秋穀梁傳例》一卷。³⁸所以「類例」是《左傳》、《公羊》、《穀梁》、董仲舒、何休、杜預、范甯共同看重的，將詞類如爵、字、氏、名、人、崩、薨、卒、葬、會、盟、戰、敗、入、滅、聘等設為主題，再敷條每則語式，歸納基本例要，以繩約《春秋》，「類例」乃是「舟楫之用，而以濟夫川瀆者也」³⁹。

柳詒徵（1880-1956）曾就《左傳》討論到凡例源起：

《左氏》所舉五十凡例，尚未足為吾國著書之有凡例之始。溯著述之有凡例，殆始於《易》之爻辭。《易》卦皆六爻，爻象陰陽，曰九曰六，此全書之通例也。而《乾》、《坤》二卦六爻之後，各加一則，以示用九用六之例，此非群書凡例之始乎？……故發凡之用，由馭繁而得執簡者也。⁴⁰

《周易》爻辭的陽爻為九，陰爻為六，六十四卦皆以九、六配衍而成，以此「通例」執簡馭繁，與後來三《傳》使用「類例」的思維相同，注重符號、字詞彼此之關係與結構，局部位置必須放回到整體系統來理解，是一種求同思維的趨向。⁴¹

³⁷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頁7。

³⁸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卷32，頁931。

³⁹ （宋）崔子方：《春秋例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335。

⁴⁰ 柳詒徵：〈史例〉，《國史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頁221。

⁴¹ 劉長林以《周易》為例，提到中國傳統思維注重整體觀念、關係與結構、平衡與穩定。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7月），頁72-73。

所以由「類例」推求《春秋》大義是一個基本模式，它是傳統思維下的運用，而《公》、《穀》在這方面的發揮較具規模，因此黃開國才會推測《禮記》「屬辭比事」的說法很有可能出於戰國《公羊》學的先師。⁴²換言之，戰國《公羊》學的先師為「類例」模式的方法概括為「屬辭比事」，而後人將《公》、《穀》當成發揮平臺，使「類例」模式的架構從疏略到縝密，逐漸形成完備體系。不可忽略的是，以《公》、《穀》為文本的屬辭比事是一條支線，也必然會有學者因為政治學術的勢力競爭而採取不同的因應對策。葛志毅說：

《左傳》同《春秋》間的經傳依存關係本無由否定，而自劉歆起一些學者圍繞《左傳》所作的工作，主要一項是以《左傳》凡例為基本依據，締構《左傳》家的說經義例體系。在這方面，公羊家義例體系完備之啟發影響作用，當不會小。⁴³

文中以劉歆（前 50-23）與後代締構《左傳》義例是受公羊家的影響，但若更精準來說，他們另擇《左傳》建構類例也是與公羊學者的競爭，試圖佔有學術話語的主導權，⁴⁴主動調整屬辭比事的量尺刻度，另外裁度《春秋》類例的方寸比例，作為唯一且絕對的解釋。

至唐代啖、趙、陸三家也是重「例」的。趙匡（?-779?）就提出「褒貶之指在乎例，綴敘之意在乎體」，⁴⁵《春秋集傳纂例》就是他們的重要著作。陸淳（?-805）說明此書是先由啖助（724-770）始撰《統例》三卷，之後趙匡損益發

⁴²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頁 85。

⁴³ 葛志毅：〈《春秋》義例的形成及其影響〉，《中華文化論壇》第 2 期（2006 年），頁 28。

⁴⁴ 程蘇東分析劉歆將「曆數」作為主要載體，重建《春秋》的義例體系，在西漢傳統以《公羊》、董仲舒、司馬遷的今文經學和時政環境中形成了極大的挑戰。程蘇東：〈史學、曆學與《易》學——劉歆《春秋》學的知識體系與方法〉，《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2017 年），頁 89-101。

⁴⁵ （唐）陸淳纂：〈趙氏損益義〉，《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卷 1，頁 7。

揮，陸淳最後纂合成書，「使學者以類求義，昭然易知，其三《傳》義例，可取可捨」。⁴⁶有別於杜預、何休、范甯各自在《左》、《公》、《穀》之上補苴闕陋，力主成為孔子《春秋》經解的一脈嫡系，啖氏等人卻重新改造義例，當然也是有意取代前者，而更重要的影響是，三子可以跳脫三《傳》與杜、何、范三家拘限，嘗試自行從屬辭比事的方法論調整出一套新例，開啓宋代之後改造屬辭比事方法論的風氣。⁴⁷

三、張本繼末：劉朔《春秋比事》解經方法的承變

前一節已推測「屬辭比事」是「類例」模式的方法論，而唐代啖、趙、陸跳脫過去的羈絆，調整出一套新例，北宋以降的學者在他們引導嘗試之下，也開始跟隨這條路數，逐漸建構不同於前人的類例模式。例如崔子方（？-1097？）有《春秋經解》十二卷、《春秋本例》二十卷、《春秋例要》一卷，其中《春秋經解·自序》認為《春秋》「辭之難明者，則著例以見之。例不可盡也，則又有日月之例焉，又有變例以爲言者」、⁴⁸《春秋本例·序》亦謂：「《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也」，⁴⁹將日、月、時之例當成詮解《春秋》的核心，每例

⁴⁶ （唐）陸淳纂：〈趙氏損益義〉，《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卷1，頁1。

⁴⁷ 晚清夏同善（1831-1880）曾上奏朝廷，推許張應昌（1790-1874）《春秋屬辭辨例編》，其中文字也可作為「屬辭比事」與「類例」有關之旁證：「《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聖經書法在聯屬其辭，排比其事而義自見，故先儒沈棠《春秋比事》、趙沅《春秋屬辭》、毛奇齡《春秋屬辭比事記》等書皆以『屬比』明筆削之義，至於其文有不可盡拘於例者。自《左氏》始作五十凡，《公羊》、《穀梁》更加日月之例，於是何、范以後，諸儒相率以例解經，而推闡愈密，苛細繳繞，轉多窒礙。……屬辭比事語在〈經解〉，固是讀《春秋》定法。至舍傳從經，掃空舊例，始自啖助、趙匡，宋元以來多為此學。」作者上溯三《傳》、何休、范甯，認為聯屬其辭、排比其事而成「類例」已是讀《春秋》定法，唐代啖助之後因為捨傳從經，所以掃除「舊例」，宋元之後無不依循啖趙學派的新治經風氣。（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頁1-3。

⁴⁸ （宋）崔子方：《春秋經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75-176。

⁴⁹ （宋）崔子方：〈春秋本例序〉，《春秋本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通志堂經解》本），頁11453。

之中又有著例、變例，四庫館臣肯定崔氏之例法「州分部居，自成條理」。⁵⁰

崔子方的「日月時例」是他的經解特色，儘管後人評價不一，但他仍可在「類例」模式發展的歷程中，佔有一席之地，成其一家之言。不過，就研究方法的內在理路來看，因為經文記錄的樣態就是如此固定，後人若再依循相同進路很難有新的創發，屬比相同辭類的事迹以構成類例的研究模式也漸漸走向瓶頸，容易流於拾人牙慧、蹈襲故常之譏。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曾對《公羊》專注系統性，近於機械式的敘事規範提出省思：

在缺少現成的編碼的情況下，難道在這令人生厭的敘事過程中就不存在某種更隱蔽的聯繫能夠重新組織事實，建立它們之間的和諧？我們能否設想一種事先就不受任何曖昧性制約的意義的微妙性？這種通過事實間接表達的意義的微妙性，讀者當然最終不能機械性地解讀它；它要求讀者默默地熟悉，我們應該應用它。⁵¹

「類例」模式並無不當，倘若經文每個字詞都是聖人有意篩選過的，那麼倫理評價確實會標誌在字裡行間，有待詮釋者鉤隱抉微。⁵²但現實狀況不僅會發生許多出例難解的問題，再加上這種方法彷彿是以一組指令而導入程式運作的形式，詮釋者的行為明顯受到制約，窄化了聖人大義的探求門徑。因此，想後出轉精就必須尋覓一條新的途徑，「屬辭比事」也就不再是「類例」獨有，逐漸產生開放的詮釋空間。

北宋初期，孫復（992-1057）、劉敞（1019-1068）、崔子方等人仍循「類

⁵⁰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7，頁341。

⁵¹ 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2月），頁96。

⁵² 弗朗索瓦認為：「在追尋向世界發出的信息中，任何記號都逃不脫注釋者的筆鋒：因為在敘述事件的紀錄中，沒有任何東西是偶然的或微不足道的，倫理評價的標志在詞的範圍中或憑借不在場的詞的空白在每一個詞上顯露出來。」同前註，頁100-101。

例」方式解經，⁵³但到北宋晚期已有學者選擇不同路徑。例如蕭楚（?-1130）著有《春秋辨疑》，內有四十四篇文章，篇目包括〈盟會侵伐統辨〉、〈兄弟總辨〉、〈弑殺辨〉、〈遷國辨〉、〈即位辨〉、〈書歸辨〉、〈書入辨〉、〈外夫人書葬辨〉、〈言伐言圍辨〉等，明顯是屬比相同辭類的事迹，從書法異同見義，符合他所說的：「《春秋》有美惡不嫌同辭者，以其屬辭比事而善惡自辨。」⁵⁴以〈外夫人書葬辨〉為例，其謂《春秋》常例：內夫人書薨書葬，若魯女爲外夫人則書卒不書葬，但《春秋》有三則經文與常例不合，分別是：齊侯葬紀伯姬（莊四）、葬紀叔姬（莊三十）、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襄三十），外夫人卻書葬。蕭楚以此爲聖人特筆，解釋路徑不是著眼於日期、地點、稱謂等單一字詞，而是結合前後經文爲評判方法。因此討論紀叔姬：「聖人于歸鄫與卒與葬皆書曰紀叔姬者，明其守爲紀侯之婦，非再歸于紀季，故曰以賢錄也」，⁵⁵談議宋共姬：「聖人書其卒，書我大夫會葬，又書其諡如此者，以其賢也」，⁵⁶褒貶紀伯姬：「彼初書紀侯大去其國，次書齊侯葬紀伯姬，伯姬蓋魯女也，觀其辭則知非正，故曰以譏錄也」，⁵⁷外夫人書葬的經文不再是封閉的詮釋場域，它們可以搭配上下不同事件的經文，取得聖人予奪之意，與崔子方著眼日月時例完全相異，研究方法雖然尚未成熟周備，但已居前嘗試，打破舊有類例的制式思考。

有別於程頤（1033-1107）後學的蕭楚，張大亨（-1085-）的學術淵源可推自蜀學蘇軾（1036-1101）。四庫館臣曰：「蓋其學出於蘇氏，故議論宗旨亦近之。」⁵⁸著有《春秋五禮例宗》、《春秋通訓》二書。《春秋五禮例宗》與《春秋

⁵³ 姜義泰觀察到：「若就啖助以降之治經成果來看，大體沿循『以例解經』之治經路徑。……像劉敞曾作《春秋說例》、崔子方作《春秋例要》，皆是對《春秋》義例的重新歸納。」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3年1月），頁466-467。（DOI：10.6342/NTU.2013.02307）

⁵⁴ （宋）蕭楚：《春秋辨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2，頁130。

⁵⁵ 同前註，頁128-129。

⁵⁶ 同前註，頁129。

⁵⁷ 同前註，頁130。

⁵⁸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7，頁343。

通訓》分屬張氏前後兩期不同的治學觀點，最早是不滿杜預《釋例》「雜以傳例，與經踏駁」、⁵⁹陸淳《纂例》「拘於微文，捨事從例」，⁶⁰因此重新綴輯，以吉、凶、軍、賓、嘉五禮爲全書體例。但到了《春秋通訓》，〈後敘〉云：「《通訓》之作，事與經同，則引事以釋經。例與義合，則假例以明義。經雖不同而事同則相從，例雖不合而義合則相比。庶幾經非空言，例非執一。」⁶¹強調經文語式即使不同，但共同涉及某項事件，應合併集結成一組系列。

到了南宋時期，劉朔《春秋比事》共有二十卷，清代四庫館臣分作兩大類：「其書前以諸國類次，後以朝聘、征伐、會盟事迹相近者，各比例而爲之說。」⁶²前九卷的確以諸國爲序，聚焦在周、魯、晉、齊、宋、鄭，但各國底下又以霸主、諸侯排列先後，以人爲條件系分的細目，舉凡諸侯在位間的經文都會集中比列討論。例如卷三魯國桓公底下立「好鄭仇宋」一小節，劉朔曰：

好鄭仇宋自隱公已然，及桓即位，其間反覆尤甚。元年以鄭伯許田之故，與公會盟。二年公會鄭伯以成宋亂，自是數年無復侵伐。至十年魯以周班後鄭，鄭仇魯，故十一年復修宋好，柔盟于折，公會于夫鍾，又會于闕。十二年又盟于穀丘，又會于虛、于龜。二年之間，會盟者六。魯之好宋非不勤，而宋終不協於魯，原魯之初，怨鄭棄好，及來戰，故激憤而交宋。宋以魯不誠其好，故會禮未終而背心起矣。公於是即鄭仇宋，是年與鄭盟于武父，遂與鄭伯伐宋。十三年，復會鄭伯與宋戰而敗之。十四年，公又會鄭伯于曹，而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及十五年，鄭厲公出奔於蔡，而世子忽復歸于鄭。厲公宋，雍氏出也，故公會宋公伐鄭以納突。至於十六年，又會宋公子曹，遂與宋公伐鄭，於是魯復與鄭仇矣。大抵宋、鄭積憾其來

⁵⁹（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序〉，《春秋五禮例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

⁶⁰ 同前註。

⁶¹（宋）張大亨：〈後敘〉，《春秋通訓》（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頁120。

⁶²（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27，頁348。

久矣，而魯介其間，與宋則背鄭，與鄭則棄宋，勢不兩立，義忘久要，交兵結怨，殆無虛歲，誠《春秋》大亂之本也。（卷3，頁34）

評論魯、鄭、宋三國的互動關係，從隱公開始溯及魯國反覆，其中魯桓公前後不一的態度最為嚴重。總共比事十七則經文，始於《春秋》桓公元年：「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終於《春秋》桓公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元代程端學（1278-1334）認為：「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主張《春秋》有大屬辭比事、小屬辭比事。⁶³清代顧棟高（1679-1759）亦曾強調自「高處立」、「大處看」的閱讀方法，如見岡巒之起伏。⁶⁴劉朔的觀察橫跨了十六年的史勢發展，經文事迹除了會盟，還包含伐、戰、出奔、歸、入，此其一。

第二，史勢不是平鋪直敘地線性發展，它具有原委、牽連或樞紐等抑揚頓挫之狀，劉朔除了敘述事實始末，也洞察風氣變遷。對應在春秋初期魯、鄭、宋交涉的歷程，桓公十年「魯以周班後鄭」是魯、宋修好的轉折，十二年「宋公辭平」則是魯國仇宋的轉折，至十五年鄭厲公出奔，魯又仇鄭而轉與宋國修好，十六年中有三次改變。呂祖謙（1137-1181）〈讀史綱目〉曰：「既視統體，須看機括。國之所以興所以衰，事之所以成所以敗，人之所以邪所以正，於幾微萌芽時察其所以然，是謂機括。」⁶⁵魯國時而與宋背鄭，時而即鄭棄宋是一「統體」，魯桓違信背約、義忘久要是一「機括」，劉朔不僅梳理史勢表徵，也點出引起波瀾的眼目，褒貶魯桓為《春秋》亂源。

如果前九卷是以諸侯在位之事迹為序，那麼後十一卷則以辭類為主軸，與類

⁶³ 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34。

⁶⁴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讀春秋偶筆〉，《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6月），頁37。

⁶⁵ （宋）呂祖謙：〈讀史綱目〉，《東萊呂太史別集》，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卷14，頁561。

例的模式相仿，鱗比相同辭類的經文，包括蒐、狩、即位、盟、會、朝、聘、侵、伐、戰、救、遂等。各辭類之下又細分不同的語式，比方「侵」又分爲：公侵、大夫侵、侵我、諸侯侵、大夫侵國、楚侵國、介人侵國，卷末亦附總論，評騭相關事義。

以《春秋》之「聘」來說，劉朔又分爲晉聘、齊聘、宋聘、衛聘、陳聘、鄭聘、楚聘、秦聘、吳聘，但這幾則「《左氏》所載雖各有事實，然筆削之意大旨略同，無可深議」（卷14，頁194），其中較特別的是「聘而盟」、「夷狄來聘」兩類。以「聘而盟」之書法，列比《春秋》成公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成公十一年：「晉侯使卻棼來聘，己丑，及卻棼盟」、襄公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認爲經書諸國來聘未有盟，是《春秋》正例，而這三則屬於異文，是《春秋》變例。

對於荀庚、孫良夫來聘及盟，劉朔的詮解是結合成公二年：「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之經文，認爲魯、衛深受齊國侵擾，於是透過卻克向晉乞師，所以魯、衛主導鞏之戰，而晉國居於輔助的角色。鞏之戰後，魯國與晉請盟，堅好固邦，防止齊國報復；至成公十一年，晉厲公初即位，魯國仍怕又受齊國軍事威脅，所以積極與晉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故此年卻棼來聘及盟，「自是終成之世，魯無齊虞者，以晉強齊弱，晉足以制齊而魯不失晉好故也。」（卷14，頁195）劉朔從魯成公在位前期與齊、晉交往，討論來聘及盟的意義，扣緊事件發生的前後關係，不是由字詞顯義。襄公十五年向戌聘盟的說解也是相同路徑：

攷經文上下，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十六年齊侯兩伐我，自是魯復與齊交怨矣，兵連禍結，比歲不解，則知魯之好盟於宋，抑必有意。蓋魯自成公時交結晉、衛以備齊，則魯之所仗者，晉、衛也。衛侯既出奔齊，是魯失一臂之助，魯懼齊衛比周，反以謀伐，是以因宋來聘而與之盟，堅其信好，以為緩急之援焉。觀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謂備齊，則魯之盟宋其為齊也明矣。（卷14，頁195）

將上下前後有關的事件全部聯繫成詮釋系統，襄公十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是屬比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點出魯國爲了對抗齊國，必須與晉、衛友好，當衛獻公出奔齊，魯國擔憂齊、衛合謀，因此聯合宋國，親善爲盟。這幾則異文變例共同彰顯「魯之國君因聘而要盟，晉衛大夫不受君命而與盟，所以交譏之也」（卷 14，頁 195），貶斥荀庚、孫良夫、卻犢、向戌等大夫。

又如「夷狄來聘」，《比事》排列《春秋》莊公二十三年：「荊人來聘」、文公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公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公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等五則經文，不依照編年排列，而是以楚、秦、吳先後爲序。劉朔發義：

吳、秦、楚三國之使，例皆去氏，而薳罷獨名氏；其人，說者謂《春秋》於三國以漸進之，故始稱人，次爵其君而名氏其臣，所以漸進也，雖似得其意而未盡。蓋聖人非以進之也，傷中國之衰微而疾三國之強盛，故進三國所以病中國也。當莊、僖以來，楚雖強橫，然前有小白，後有重耳；景、悼、厲三公亦克紹霸，足以駕強楚，故召陵之盟、城濮之役、鄢陵之戰、蕭魚之會皆有服楚之功。至襄十五年，悼公既卒，湏梁之盟大夫專政，中國始無霸主，是致楚人得逞，桀傲不制，馴致昭四年遂主會于申，則其憑陵天下，蓋數倍於曩時矣。故聖人於襄三十年特氏其臣，以同諸侯之文，又進楚於諸侯，所以甚傷中國之削弱也。三《傳》不明聖人大旨，或謂褒楚子、賢繆公、善使季子，義亦淺矣。（卷 14，頁 195）

《春秋》夷狄的稱號並非齊一，劉朔反對歷來以嘉許夷狄能修中國之禮，故漸進善之的說法，主張夷狄是「假聘問之虛名以爲驅迫之資也」，與好尚禮文一事無關。他也注意到這五則經文中，唯襄公三十年獨稱「薳罷」，與其他去氏僅稱「椒」、「術」、「札」等常例不同，是一變例。解析進路是集中在齊桓、晉文、晉景、晉悼、晉厲幾位霸主，認爲他們克修繼業，制衡楚虐，有服楚之功；但從

晉悼之後，中國始無霸主，因此楚人得以交亂華夏、禍亂中國，所以特氏「薳罷」，傷中國衰微而疾楚、秦、吳三國強盛。解釋總共統合了自僖公四年召陵之盟、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役、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襄公十一年蕭魚之會，再到襄公十五年晉悼公卒、襄公十六年淝梁之盟、昭公四年申之會等經文，藉此解釋「楚子使薳罷來聘」這則變例之因。

相較於劉朔《比事》，張大亨《春秋通訓》也有屬比荊人來聘、楚子使椒來聘、楚子使薳罷來聘、秦伯使術來聘、吳子使札來聘等五則經文：

- 荊敗蔡師于莘。（莊十）
- 荊人來聘。（莊二十三）
- 楚人伐鄭。（僖元）
-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僖二十一）
楚子使椒來聘。（文九）
-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歙、邾人會吳于鍾離。（成十五）
-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襄五）
-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襄十）
- 吳子乘卒。（襄十二）
-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丐、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襄十四）
- 吳子使札來聘。（襄二十九）
- 叔還會吳于柤。（哀六）

首先，經文不只有夷狄來聘，還包括伐國、諸侯會、大夫會等，突破舊有類例以遣詞用字為序列的規範。第二，聚集這類經文最主要顯示：楚、吳在齊桓方霸未能與上國分庭伉禮，至齊桓既沒，楚、吳不以禮義自居，所以《春秋》從荊、荊

人改書楚人、楚子，從吳改書爲吳子，「蓋以明東遷以來盛衰之漸也」。⁶⁶雖然組合的結果與劉朔不同，但一樣打破類例規範化的思考，有意識地經營佈局，屬比經文不再全然託於詞類。

姜義泰評論張大亨的纂輯特色：「張氏歸納經文的方式，大多自出己意，突破過往義例侷限，匯聚他認爲應當相關的經文；或者單列一條，或者單述某一事件。歸納經文的標準其實具有非常大的主觀隨意性。或者與過往經例相同，或者自出新意。」⁶⁷如果我們將北宋張大亨的排法置於「類例——屬辭比事」之發展，他的分類確實是新突破，但就因爲是新突破，所以會像姜義泰所說的，主觀性強烈、缺乏統一性，畢竟新的屬辭比事法還處於初步嘗試的階段，難免未具條理、系統等成熟要件。不過學術隨著時代推進，南宋劉朔能參考前人經驗，先以傳統基本的類例爲架構，再聚集前後有關的經文，改變過往單從字詞爲依歸的模式，不僅重新定義屬辭比事，方式策略上也相對較有章法。⁶⁸

但必須注意，蕭楚、張大亨、劉朔統合前後經文的屬辭比事並非憑空新立，而是借取《左傳》張本繼末的敘事之法。張素卿討論屬辭比事時，曾點出《左傳》「張本繼末而脈絡潛通」的特點，援引杜預「張本」說，並佐以荀崧（262-328）、竹添光鴻之語，印證《左傳》融貫前後傳文，歷述委曲脈絡：「左氏既消融史料、刪裁潤色，大抵依經以編年敘事，爲使原委詳明，又往往前傳張其本、後傳繼其末，彼此照應而絲牽條貫。」⁶⁹由此可見，新的屬辭比事之法與

⁶⁶ （宋）張大亨：《春秋通訓》，卷3，頁41。

⁶⁷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頁422。

⁶⁸ 雖然蕭楚、張大亨、劉朔等人開始使用新的屬辭比事之法，但不代表傳統的「類例」就消失在學術舞台，仍有學者試圖改造傳統類例，除了補正類例的缺失，更關鍵是可以突顯自身和前人的差別。像文中所舉的崔子方就以「日月時例」爲核心，又如南宋胡安國《春秋傳》〈明類例〉也強調由例解經，例中見義，注入「理欲」的色彩，使傳統類例發展出新面貌。康凱淋曾就《春秋》書「弑」，謂胡安國《春秋傳》基於弑君經文，「闡發《春秋》存天理、抑人欲之義，認爲仲尼以書法督教，彰顯天理綱紀，不使人欲橫流，倫常紊亂。」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詮解《春秋》書弑析論〉，《國文學報》第58期（2015年12月），頁1-44。（DOI：10.6239/BOC.201512.01）

⁶⁹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194-195。

《左傳》敘事有關，⁷⁰北宋學者發揮此門徑，至南宋劉朔《春秋比事》通觀歷史積漸的形勢，同樣體現張本繼末、原始要終的功能，聯屬前後經文的範圍各有遠近深淺的差異，繩貫事件的背後也自有一套經緯。⁷¹

四、德：劉朔《春秋比事》中的價值判斷

（一）從「事勢」到「理勢」

何佑森說：「經學家認為勢是自然的，也就是說，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自然之勢，但人對歷史所付出的努力應符合一個絕對永恆不變的道德法則。……經學家從理看勢，認為理是永恆不變的一個法則，是勢的泉源。理是個『源頭活水』，是勢的所以然。這個泉源是真實的，至善的，道德的。」⁷²古代「勢」的定義豐富多變，先秦兵家、法家各有不同的運用和解釋，至西漢賈誼（前 200-前 168）開始將歷史教訓導入「勢」的思考，和國家施政緊密結合。例如秦朝統一天下卻旋即滅亡，箇中興衰的關鍵就在「仁心不施」，從「事勢」變化揭櫫「道德」的歷史教訓。所以賈誼在側重現象敘述的「事勢」之外，還列置了傾向本質敘述的「理勢」，著重分析背後成因，宋明理學家深受賈誼啟發，皆寓有這類的歷史思考，⁷³

⁷⁰ 《左傳》敘事張本繼末應有淵源，可能承自古《春秋》記事之法。劉師培曰：「古《春秋》記事成法今不可考，惟《墨子》〈明鬼篇〉所述，有《周》、《燕》、《齊》、《宋》各《春秋》，於杜伯、莊子儀諸事，爰始要終，本末悉昭，則記事以詳為尚矣。」雖然實際相沿情形已難考察，但《左傳》這方面的敘事成就卻最為具體有序，故本文仍將張本繼末的敘事之法上推自《左傳》。（清）劉師培著，鄒國義、吳修藝編校：《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521。

⁷¹ 雖然劉朔借取《左傳》張本繼末的敘事之法為屬辭比事，但不表示可直接將《左傳》敘事與「屬辭比事」畫上等號，僅能將《左傳》敘事視為宋代劉朔《春秋比事》屬辭比事之濫觴。

⁷² 何佑森：〈歷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勢」〉，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頁244-245。

⁷³ 盧瑞容分析自先秦以來兵家、法家、荀子，以及漢代賈誼「勢」概念的演變，認為賈誼結合國家政策和歷史發展的「勢」論，提供後代施政制度的思辨基礎，並提出宋明儒者對賈誼「事

何佑森將「理」解為「道德法則」也是承續相同的論述主軸。

劉朔《比事》排列經文，稽源觀流，同樣體現出春秋「事勢」的遞變，在這遞變過程亦寓有「理勢」的思維模式，關注「道德法則」，多次提到修德的重要：

「夫以諸侯之尊，據有一國，當修德愛民，使國人推戴」（卷8，頁110）、「夫霸者之服諸侯，非獨兵威之盛足以鋤強去暴，亦在有德以懷服之耳」（卷9，頁128）。如果將春秋盛衰的升降，比喻為岡巒連綿之起伏，那麼「君德」就是劉朔定位出的稜線走勢。例如〈小白侵伐併吞執大夫〉，《比事》記載：「小白之興，伯德不純。二十六年之間，盟會諸侯雖假仁義號尊王室，然其實則逞志威武，肆侵奪以尊己也。故自入齊以來，大國則侵伐之，小國則并吞之，而《春秋》皆例稱人者，所以惡齊侯也。」（卷2，頁25）羅列齊桓侵伐大國、并吞小國、執諸侯大夫等十七條經文之事，抨擊小白以伯主之威，不能德服諸侯，而反蹈肆虐之惡，用兵滅國，故經文侵伐執滅，例貶書人。

即使春秋初期，「小白主霸，方崇禮義，去侵伐以救當時之弊」（卷2，頁29-30），但也未能盡合聖人貴禮義、賤武力的標準，遑論其他諸侯無法與齊桓相侔，因此多有貶斥。《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諸侯遂圍許。」劉朔曰：

晉文興霸敗楚城濮，踐土之盟、溫之會兩合諸侯，許皆不至，故會諸公圍之也。夫小白圖霸，許未嘗不服；重耳驟服強楚，有震諸侯之威，如許之小國宜俯首脅息，聽命於下風也。今兩會不至，則知晉文之德蓋歉於齊侯矣，不能以德綏諸侯而因會以圍之。及明年盟于翟泉，許又不至，終重耳

勢」、「理勢」的運用特點：「賈誼所獨創的『事勢』及『理勢』兩個詞彙，更在無意中啟發了宋明理學家的歷史思考論述空間。……宋明儒大量運用這兩個詞彙，但由於是用來討論歷史，因此他們的『事勢』之義，就不像賈誼那邊只限於『當前』，反而是比較廣泛的『情勢發展』或『客觀情勢』之義；而『理勢』一詞則仍以『道理』之義為主。易言之，『事勢』者著重於『現象敘述』，而『理勢』則著重於『本質敘述』。」盧瑞容：〈「勢」概念之形成及其義涵發展〉，《中國古代「相對關係」思維探討——「勢」「和」「權」「屈曲」概念溯源分析》（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4年6月），頁19-122。

之世不能得許，則其威德不信於諸侯可知也。故《春秋》書此，惡重耳以霸主之威合諸侯之眾，壓之以兵不能致一小國也。（卷 19，頁 240-241）

統合晉文「溫之會」、「踐土之盟」、「翟泉之盟」中，許國不與的情況，再與齊桓相較，得出「晉文之德蓋歉於齊侯」的結論，故經文書「遂」，貶斥晉文以力制人，不能以德綏之。又如《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批評宋襄公不度德量力：「以《春秋》之法責之，罪不在楚而在宋。……襄公無小白之德而苟求大功，其敗亡固宜又何憾焉？」（卷 8，頁 108）宋襄公沒有撫柔之功，圖霸中原如同南轅適燕，行事頓斃可作為後世覆轍之戒。⁷⁴

黃俊傑主張中國傳統史家和儒家學者強調在「價值」脈絡中堅持「事實」，從此「價值」解讀「事實」的意義，從歷史敘事提煉出理念準則，有「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的融合，而寓褒貶、臧否人物都是融合的特徵。⁷⁵劉朔《比事》闡述春秋歷史人物的行為得失，從他們的行事建構出某個歷史發展的成因或轉折，這就是將「德」作為「價值判斷」的指導方針。像前面討論的齊桓、晉文、宋襄，或是諸侯各國國事，例如〈莊公與齊、衛、宋、魯、陳、蔡仇好終始〉一節，文末總結：「凡自齊至陳蔡六國與鄭仇好之迹，其反覆如此，是無禮義以維持而求便一己之私，所以至紛然者歟！」（卷 9，頁 121）「德」與「禮」是內外相輔的倫理規範，⁷⁶各國私營己利，拋棄內在道德的價值追求，在同好相趨，同患相求，不以禮義相合的狀況下，必流於貪而無信、變詐反覆。對應到「盟會」，也正是出於「衰周之際，王德不競，信義不足以懷遠，威刑不足以制強」（卷 12，頁

⁷⁴ 其他內容如〈宋世家〉批評宋殤公「無德而威」（卷 8，頁 103），〈鄭世家〉責備鄭莊公「無帝舜之德，終致母子乖離、兄弟相殘」（卷 9，頁 119）都是相同事例，茲不贅述。

⁷⁵ 相關論述見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1 月），頁 275。（DOI：10.6327/NTUPRS-9789863500476）

⁷⁶ 黃開國：「禮是春秋時期人們所共同承認的社會典章法則，也是人們一切行為的總規範。……對於春秋時期人們所講的德而言，也受到禮的制約與決定。凡被稱之為德的言行，都無不是合於禮的規定的。」黃開國：〈春秋時期的德觀念〉，《孔孟月刊》第 35 卷第 9 期（1997 年 5 月），頁 35-42。

161) 的時勢，造成春秋諸侯背信生亂，無法禁制的禍變。

又如《春秋》書「城」，劉朔亦曰：「凡此書城，雖無他義，皆譏國君勞民費財，不務修其德政，以爲安強之計。」（卷 10，頁 139）或是《春秋》書「大雩」，劉朔批評春秋之際，暴君汙吏以賦斂繇役殘害生民，又以祭祀虛文愚弄百姓，和古代先王「修德應天，勤恤民隱，無或豫怠，是以雨暘得時，得時而民」（卷 11，頁 153）形成強烈的對比。因此，劉朔《春秋比事》重新整輯編年體《春秋》，序列史事雖以時間爲形式的先決條件，但不單只呈現自然時間的演進，它還包括時間邏輯的安排，變成有首尾相貫、推演損益之「事勢」；而且一旦賦予「德」的人文意義之後，「事勢」之變遷又寓有回顧性和前瞻性的特點，⁷⁷成爲蘊有價值判斷的「理勢」，延續述往事、思來者的歷史教訓與文化精神。

（二）有別於陳傅良「事勢一伯業迭興」的歷史解釋

劉夙、劉朔兄弟曾留駐永嘉溫州，⁷⁸《宋元學案》評價二人：「永嘉學術之盛，兄弟皆與有力焉。」⁷⁹而永嘉學者如薛季宣（1134-1173）、陳傅良（1141-1203）、葉適等人對《春秋》多有研究，其中陳傅良《春秋後傳》的篇幅和論述最爲完整，學界不約而同地點明陳傅良《春秋》學有「通世變」的色彩。⁸⁰檢閱《春秋後傳》一書，確實如各家所言，陳傅良看重春秋歷史之升降，析理中國如

⁷⁷ 吳光明將歷史喻爲音樂，認爲兩者具有回顧的不可避免性、前瞻性的自由性，而且會按照一定的時間秩序展現時間邏輯。吳光明：《歷史與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 9 月），頁 54-55。

⁷⁸ 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曰：「著作（劉夙）既釋褐，調吉州司戶、臨安府教授。會正字（劉朔）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宋）葉適：〈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水心文集》，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卷 16，頁 302。

⁷⁹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艾軒學案〉，《宋元學案》，卷 47，頁 1477。

⁸⁰ 例如黃覺弘強調：「陳傅良不僅繼承薛季宣『通世變』精神，更是將『通世變』作為至關重要的《春秋》大義。」趙伯雄也認爲陳傅良「主張對《春秋》所歷二百四十二年做歷史的考察，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5 月），頁 260。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2 月），頁 546。

何從周室墜緒淪為蠻夷爭勢的變化，作為歷史敘事的主體脈絡。樓鑰（1137-1213）曾總括《後傳》解經的歷史敘述：

始焉，猶知有天子之命，王室猶甚威重。自霸者之令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矣。桓公之後，齊不競而晉霸；文公既亡，晉不競而楚霸，悼公再霸而又衰，楚興而復微，吳出而盟諸夏，於越入吳而《春秋》終矣。^{⑥1}

歷史不屬於靜止狀態，它的過程蘊含連續性與變動性。從樓鑰所述，我們可發現在這連續性與變動性的過程中，止齋對伯主的一舉一動特別注意，因為伯主不僅左右著周天子的政治地位，也關係夷狄是否陵夏侵華。所以像齊桓、晉文之後，華夏諸侯漸已失去伯主，陳傅良將目光置於中國失伯、夷狄初伯等形勢發展：

《春秋》文公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後傳》：垂隴嘗書士穀而序諸侯，此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也，則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

《春秋》宣公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後傳》：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予楚以伯也。

《春秋》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後傳》：人自為盟，自鹿上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久無伯也。^{⑥2}

將扈之盟、辰陵之盟、清丘之盟等經文屬詞的書法歸結至「晉始失伯」、「初予楚以伯」、「中國久無伯」等歷史解釋，表現出對伯業迭興的關注，其他經文又

^{⑥1} （宋）樓鑰：〈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旨序〉，《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卷51，頁699。

^{⑥2} 引文分見（宋）陳傅良：《春秋後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通志堂經解》本），卷6，頁12170；卷7，頁12179；卷7，頁12180。

陸續點出楚國與華夏抗衡的形勢：

《春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後傳》：兵將嘗書大夫，此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也，曷為貶稱人？

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

《春秋》文公十年：夏，秦伐晉。

《後傳》：狄秦也。歸成風之襚，使術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

楚之伯，秦之力也。

《春秋》文公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後傳》：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次何？以楚之欲圖伯而未集也。

《春秋》宣公元年：晉趙盾帥師救陳。

《後傳》：書救陳何？楚由是始伯也。⁸³

從晉靈公失伯不競、秦康公協助楚穆王爭伯，再到楚莊王崛起始伯，陳傅良的目光都建構在「伯業迭興」這條脈絡，循此脈絡詮解經文書法，和劉朔同樣是比次前後相類的事迹，統合連屬，張本繼末，推演其原委始終之「事勢」。不過劉朔《比事》因為有蒐、狩、即位、盟、會、朝、聘、侵、伐、戰、救、遂等各種辭類編排，所以「事勢」具備多條主線、副線、支線以絲牽繩貫，而陳傅良《春秋後傳》「事勢」僅聚焦在「伯業迭興」的歷程，並視為唯一主線，勾勒霸主初伯、失伯、復伯、無伯等世變圖景。⁸⁴如同他向賈端老（？-？）提點的讀書方法：「《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為據案。」⁸⁵或是陳傅良弟

⁸³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6，頁12171；卷7，頁12177。

⁸⁴ 康凱淋：「不論從宏觀或微觀的取徑角度分析史事，舉凡春秋之世道升降、華夏盛衰、列國離合皆與『伯業更迭』休戚相關，陳傅良將『伯業更迭』作為《春秋》世變的解釋主體，從中推明興衰、收離、起伏、聚散之狀。」康凱淋：〈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東華漢學》第30期（2019年12月），頁175。

⁸⁵ （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答賈端老四〉，《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卷35，頁456。

子曹叔遠（1159-1234）在紹熙二年（1191）向朱熹（1130-1200）問學，⁸⁶述及其師指導研治《春秋》學的重點：「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伯者與奪之義。」⁸⁷查察春秋歷史主要圍繞在「事勢——伯業迭興」的開闔起伏、收離聚散之狀，所有發展皆依附於此，在相同的「事勢」語境中與劉朔有不同層次的進展語脈。更重要的是，「理勢——道德法則」並不作為陳傅良《春秋後傳》的核心命題，所以陳、劉二人即使皆具「史眼」特質，⁸⁸勾勒歷史發展大勢，但兩方仍呈現相異的研究走向。

比方《春秋》襄公十年：「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傳》記載諸侯之師城虎牢、晉師城梧及制，晉鄭媾和，故楚子囊救鄭。陳傅良《春秋後傳》曰：「楚數救鄭矣不書，於是始書，以為晉悼復伯，楚欲救而不能也。」⁸⁹將經文「楚救」之書法聯繫至晉悼復伯，有別於宋儒解釋成罪貶華夏諸侯，⁹⁰但更重要的是，因為目光集中在晉悼伯業，所以其他經文的詮解方向都是循此角度。⁹¹是故，陳傅良是以伯業更迭為詮釋主體，從經文書法建構伯主相競的脈絡演變，每則經文有必要與前後經文比次牽連，方能完整呈現諸侯再伯、失伯、復伯等「事勢」。

劉朔《比事》也有分析「楚公子貞帥師救鄭」，但卻和哀公十年：「吳救陳」

⁸⁶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9月），卷下，頁1204。

⁸⁷ （宋）朱熹：《朱子語類》，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8冊，卷120，頁3785。

⁸⁸ 李建軍：「陳氏治經，又反對一些經學家以例言《春秋》的陋習，而主張根據『世變』來理解經義。……正是著眼於歷史發展的大勢，正是欲以史眼來探《春秋》經義。」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6月），頁57-58。

⁸⁹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9，頁12192。

⁹⁰ 如胡安國（1074-1138）云：「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卷21，頁350。

⁹¹ 如《春秋》襄公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陳傅良將經文書伐又言次連合晉悼難以再伯，至《春秋》襄公八年：「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春秋後傳》亦曰：「自同盟于戚而大夫與諸侯序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復予晉以伯也。」同樣關注晉悼伯業的盛起。（宋）陳傅良：《春秋後傳》，卷9，頁12189、頁12191。

同置於「夷狄救」之下並談，先溯及晉靈公、成公、景公、厲公時晉楚爭鄭的梗概，再談到晉悼公城虎牢、盟亳城、會蕭魚，有攘楚之功。後又表述吳國橫行華夏，侵齊、伐魯、敗楚、服陳，橫跨數十年的史勢發展，轉折就是「晉德既替，楚亦衰微」（卷 18，頁 237）。然而晉悼興霸，起伏遞變之「事勢」不是最要緊的，「夫爲盟主，伐叛柔服，用彰威德」（卷 9，頁 125），陳、鄭二國最難綏服，但晉悼得陳，「不舉一戰，乃能使慕德悅義，背強楚而即中國，則其霸業之強，殆不減於重耳焉」、「非悼公德不足以懷之，強不足以服之」（卷 6，頁 77），起伏遞變背後的「理勢」成因才是關鍵，和陳傅良歷史解釋的著眼不同。

所以從宏觀的角度來講，劉朔常駐永嘉，和永嘉學者陳傅良皆注重事件的本末源流、時移世易與因果原委之「事勢」，這是地域學術中的「重同」共相。但若以微觀而言，劉朔卻有不同的觀察視野，具備「趨新」殊相——道德判斷之「理勢」，⁹²以此載體而突出成就於學術平台。換言之，同樣俯察伯業盛衰之「事勢」，永嘉學派一旦忽略「理勢」則容易導向「功利」之譏，如同朱熹對浙學的批評：「《春秋》之作，不爲晉國伯業之盛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尊王，賤伯；內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⁹³而劉朔在「事勢」以外更強調「理勢」，側重「道誼」的歷史思考，有別於永嘉學派的學術路線，避免陷入權譎功利的話病。⁹⁴

⁹² 李暢然：「微觀研究趨新，宏觀研究重同。微觀研究的興奮點與傳統的哲學史、學術史是一致的，即以求新求異爲任，而宏觀研究則不然，它在尊重、重視對象差別、對立的前提下盡管發掘其近似和統一的一面。」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2月），頁28。

⁹³ （宋）朱熹：《朱子語類》，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冊，卷83，頁2867。

⁹⁴ 朱熹批評浙學流於功利之弊：「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爲害不小」、「今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害」。同前註，第18冊，卷123，頁3873；第17冊，卷94，頁3168；第17冊，卷83，頁2857。

五、結語

陳亮將原本所見的《春秋總論》改名為《春秋比事》，應是與自身「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頁8）的治經方法有關。所以他在閱讀《春秋比事》勢必會將目光投射於排比、聚合事實始末的手法，但這不表示《春秋比事》重「比事」而輕「屬辭」。劉朔統繫「比事」正與「屬辭」密切相關，只是不像舊有的類例系統，敷條經文語式，以一套指令或框架帶入每個字詞，而是進一步開放了經文之間的依存關係，選擇以事件的開闔起伏、收離聚散，作為聯屬辭語的網絡，不再侷限於傳統的語式型態，所以經文之間不僅有了語式型態的交集，還有類事始末的聯集，突破「類例——屬辭比事」的解經方法，可謂別開蹊徑。其次，研究中、西詮釋學比較的學者楊乃喬指出：「儒家經典詮釋是詮釋主體為自己營造的一方生存的境遇，……詮釋主體對『六經』及《十三經》的理解與解釋在某種原則上不是為了追尋其原初意義，而是依託經典及假借對經典原初意義的理解與解釋，為詮釋主體及同期的統治意識形態構建一方生存的空間或攫取存在的話語權力。」⁹⁵「德」是中國傳統重要的人文觀念，在民族發展中形成文化制約，劉朔的闡釋也是傳遞這套制約的價值，但身處在當代以己意解經的新詮釋風潮，他在形式上改造類例的解釋路徑，以聚集前後經文取代遣詞用字的行為模式，又在歷史事件尋繹一條「修德」之重要法則，將「屬辭比事」和「倫理道德」環環相扣，形成經緯聯絡的紐帶，這知識形態的建構何嘗不是一種生存競爭？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

⁹⁵ 楊乃喬：《中國經學詮釋學與西方詮釋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4月），頁25、27。

-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
- (唐)魏徵等：《隋書》(臺北：史學出版社，1974年)。
- (唐)陸淳纂：《春秋啖趙集傳纂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 (宋)胡安國撰，錢偉彊點校：《春秋胡氏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4月)。
- (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5月)。
- (宋)崔子方：《春秋例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崔子方：《春秋經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崔子方：《春秋本例》(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通志堂經解》本)。
- (宋)張大亨：《春秋通訓》(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 (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 (宋)蕭楚：《春秋辨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朱熹：《朱子語類》，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宋)呂祖謙著，黃靈庚、吳戰壘主編：《呂祖謙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 (宋)劉朔：《春秋比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陳傅良：《春秋後傳》(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5年，《通志

堂經解》本）。

（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先生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宋）樓鑰：《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宋）葉適著，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12月）。

（元）程端學：《春秋本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都穆：《南濠居士文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本）。

（清）顧棟高輯，吳樹平、李解民點校：《春秋大事表》（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6月）。

（清）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1月）。

（清）高宗敕撰：《欽定禮記義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黃宗羲原著，（清）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2月）。

（清）陸心源著，馮惠民整理：《儀顧堂書目題跋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9月）。

（清）鍾文烝撰，駢宇騫、郝淑慧點校：《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7月）。

（清）凌曙：《公羊答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叢書集成初編》本）。

（清）張應昌：《春秋屬辭辨例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本）。

（清）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

（清）劉師培著，鄒國義、吳修藝編校：《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

（清）皮錫瑞著，周春健校注：《經學通論》（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 年 4 月）。

二、近人論著

（一）專著

弗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著，杜小真譯：《迂迴與進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年 2 月）。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11 月）。

吳光明：《歷史與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 年 9 月）。

宋鼎宗：《春秋宋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9 月）。

李建軍：《宋代《春秋》學與宋型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6 月）。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 11 月）。

李暢然：《清代《孟子》學史大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 2 月）。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9 月）。

阮芝生：《從公羊學論春秋的性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9 年 8 月）。

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志校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3 年 12 月）。

柳詒徵：《國史要義》（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07 年 5 月）。

范文瀾：《群經概論》，《范文瀾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1 月）。

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年 3 月）。

張高評：《比事屬辭與古文義法——方苞「經術兼文章」考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年 7 月）。

曾亦、郭曉東：《春秋公羊學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年 3 月）。

黃俊傑：《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 年

1 月)。(DOI: 10.6327/NTUPRS-9789863500476)

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 3 月）。

黃覺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4 年 5 月）。

楊乃喬：《中國經學詮釋學與西方詮釋學》（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 4 月）。

楊果霖：《《經義考》著錄「春秋類」典籍校訂與補正》（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3 年 1 月）。

趙友林：《《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 12 月）。

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7 月）。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臺北：中新書局有限公司，1977 年 4 月）。

盧瑞容：《中國古代「相對關係」思維探討——「勢」「和」「權」「屈曲」概念溯源分析》（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2004 年 6 月）。

戴維：《春秋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5 月）。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年 9 月）。

（二）期刊論文

康凱淋：〈永嘉學派與《春秋》世變——以陳傅良《春秋後傳》為例〉，《東華漢學》第 30 期（2019 年 12 月），頁 165-200。

康凱淋：〈胡安國《春秋傳》詮解《春秋》書弑析論〉，《國文學報》第 58 期（2015 年 12 月），頁 1-44。(DOI: 10.6239/BOC.201512.01)

程蘇東：〈史學、曆學與《易》學——劉歆《春秋》學的知識體系與方法〉，《中國文化研究》冬之卷（2017 年），頁 89-101。

黃開國：〈春秋時期的德觀念〉，《孔孟月刊》第 35 卷第 9 期（1997 年 5 月），頁 35-42。

葛志毅：〈《春秋》例論〉，《管子學刊》第 3 期（2006 年），頁 65-77、110。

葛志毅：〈《春秋》義例的形成及其影響〉，《中華文化論壇》第 2 期（2006 年），頁 25-37。

（三）論文集論文

何佑森：〈歷史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勢」〉，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

議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
（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 年 6 月），頁 241-249。

（四）學位論文

姜義泰：《北宋《春秋》學的詮釋進路》（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
2013 年 1 月）。（DOI：10.6342/NTU.2013.02307）

張厚齊：《《春秋》義法模式考述》（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論文，2012
年 6 月）。

Compare and See: The Method of “List and Compare” in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mparison by Liushuo

Kang, Kai-Lin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thinking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for scripture analyzing is to gather events in similar traits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law and principle of saints from the same wordings. In this study, “list and compare” is considered as the methodology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for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before Tang Dynasty. In other words, “list and compare” are the process, method, and form when thinking, and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is the model, result, and content generated from the thinking. Only after the modification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by Dangzu School, then the trend of “list and compare” in Song Dynasty started to emerg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mparison by Liushuo*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one of the works under such new trend.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use of “list and compare,” Liushuo took the description method of “full explanation” in *Zuo Zhuan*, connecting relevant texts of the event and jumping out of the frame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where the list is purely composed of words. Such broke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category - list and compare”. Thirdly, Liushuo once promoted the

school of Yongjia. Compared with the scholar Chen Fuliang, who were in the region of Yongjia, Liushuo added a value determination of “morality and trend”, even though both stressed the history evolution of “situation and trend” in Chunqiu Period. Discovering a principle of “morality learning” and connecting “list and compare” with “ethics and morality”, Liushuo clearly has a different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rom that of Chen Fuliang’s in terms of explaining historical figures during Chunqiu Period.

Keywords: Liu Shou, the Juxtaposition and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Events, Chun Qiu, Zou Zhuan, Virtues